

# 企业年金发展与税收优惠政策

## ——基于 OECD 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朱铭来，季 成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本文在对 OECD 国家企业年金优惠政策进行简要评述的基础上，利用 26 个 OECD 国家 2001 - 2011 年的数据，采用系统 GMM 方法就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年金缴费环节的税收减免政策从增大企业年金税收弹性和减弱交叉税收弹性两方面对企业年金缴费产生了显著的激励作用，另外，我们发现就业率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年金缴费的增长，而年金账户短期收益、股票收益及社会公共养老支出对企业年金缴费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税收优惠；企业年金；弹性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892(2014)07 - 0031 - 07

###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借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我国基本解决了现阶段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发放问题。但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预计到 2050 年，中国 65 周岁以上人口与 20 - 64 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45.4%，不仅超出亚洲平均水平 30.7%，而且超过美国 39.5% 和英国 44.1%<sup>①</sup>，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养老金账户存在严重缺口，2012 年已有 19 个省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个人账户缺口扩大到 5602 亿元，基本养老金已不能完全保障我国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sup>②</sup>，并且单靠财政补助来进行弥补的做法，未来难以为继。因此，如何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政府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sup>[1]</sup>。

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可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减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和财政负担，是一项低成本的长效社会稳定机制。但是我国从 1991 年建立补充养老金制度以来，企业年金至今发展缓慢：我国企业参与率<sup>③</sup>仅为 2 - 3%，远低于发达国家 40% 以上的水平；职工参与率<sup>④</sup>仅有 1.5% 左右，与发达国家接近 60% 的水平相去甚远；企业年金平均替代率持续不到 1%，远远落后于美国的 40%、OECD 成员国平均 9% 的水平(郑

收稿日期：2013 - 12 - 03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13JJD840004)；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05)  
作者简介：朱铭来(1970 -)，男，天津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季成(1985 -)，男，天津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发布《2010 世界人口展望》。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2013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2013》。  
③ 用建立年金的企业占有所有企业的比重来代表。  
④ 拥有企业年金账户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秉文，2010)<sup>[2]</sup>；截至 2011 年底，企业年金资产占 GDP 的比重仅为 0.76%，与全球平均 38% 及 OECD 平均 78.9% 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甚至低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

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年金的发展和政府税收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观点在很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得到支持 (Horiba、Yoshida, 2002；Fehr、Jess, 2007；Fehr 等, 2008；Gentry、Rothschild, 2010；Disney, 2010)<sup>[3][4][5][6][7]</sup>，国内学者也纷纷结合中国情况阐述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年金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性 (邓大松, 2003；朱青, 2002；刘云龙等, 2002)<sup>[8][9][10]</sup>，但多集中于对单个国家或单一税收模式相关政策经验的描述性分析，缺乏对政策效果的系统和量化研究，特别是对影响发生机制方面缺乏具体实证支持，因此本文力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国别比较方法，通过计量统计模型，针对企业年金缴费环节的税收减免政策，探究其对企业年金规模成长的具体影响程度，以实现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及完善提供实证支持。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实证模型设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国际经验

通过对 OECD 国家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整理来看，目前最流行的税收优惠模式为 EET 模式 (表 1)，我们重点关注对第一环节的减免税优惠，企业年金制度建立的初衷为补充基本养老保险，而企业也将其视为提高员工福利待遇、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一种手段。如果国家又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加以鼓励，则大大增强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动因，有效地降低企业激励员工的成本。对企业来说，用同样的钱取得了不一样的激励效果，对于员工而言，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允许员工缴费在税前列支对员工缴费也会产生很大激励作用。因为缴费能够在税前列支无疑有助于降低员工工作当期的边际税率。即使员工退休后领取的企业年金待遇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职工在退休期的整体收入水平下降，适用的边际税率也会大大降低。

表 1 主要 OECD 国家不同税收模式

| 国家    | 税制类型 | 国家    | 税制类型 |
|-------|------|-------|------|
| 澳大利亚  | TTT  | 韩国    | EEPT |
| 奥地利   | EET  | 卢森堡   | TET  |
| 比利时   | EEPT | 墨西哥   | EEPT |
| 加拿大   | EET  | 荷兰    | EET  |
| 智利    | TTT  | 新西兰   | TTE  |
| 捷克共和国 | TET  | 挪威    | EET  |
| 芬兰    | EET  | 波兰    | EET  |
| 丹麦    | ETT  | 葡萄牙   | EEPT |
| 法国    | EEPT | 斯洛文尼亚 | TET  |
| 德国    | EEPT | 西班牙   | EEPT |
| 希腊    | EET  | 瑞典    | ETT  |
| 匈牙利   | TTE  | 瑞士    | EET  |
| 冰岛    | EET  | 土耳其   | EEPT |
| 爱尔兰   | EEPT | 英国    | EEPT |
| 意大利   | ETT  | 美国    | EET  |
| 日本    | EEPT |       |      |

资料来源: OECD tax database (various years) ; country responses to the Secretariat’s questionnaires; ISSA-INPRS (2003) ; *European Tax Handbook* (2003), 各个阶段征税用“T”表示, 免税用“E”表示, “PT”为部分免税。

(二) 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从企业年金市场需求层面考察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和个人缴纳企业年金的激励效应，结合其他影响企业年金缴费的其他因素，建立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

$$\ln pension_{it} = \beta_0 + \beta_1 \ln income_{it} + \beta_2 \ln tax_{it} + \beta_3 return_{it} + \beta_4 stock_{it} + \beta_5 public_{it} + \beta_6 employ_{it} + \beta_7 old_{it} + \mu_{it} \quad (1)$$

基准模型中考虑了影响企业年金缴费的基本影响因素，模型中包含的变量及含义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模型使用的因变量 pension<sub>it</sub> 为企业年金账户人均缴费，为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总额。是国家 i 在 t 年的企业年金账户缴费额，经过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为 2001 年末的货币单位，再除以各国家 (地

区)各年度的总人口数,以反映该国企业年金的年缴费情况。

## 2. 支付能力的解释变量

模型中,  $income_{it}$  为人均国民总收入,同样按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为 2001 年末的货币单位。企业年金作为个体进行收入支配时的一种选择,个体收入的提高必然会给企业年金的增长带来一种正向的“收入效应”。模型中收入变量取对数不仅缓解异方差的影响,其系数也可以直接体现年金缴费的收入弹性,预期其回归系数为正。 $tax_{it}$  为税收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是直接影 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因素。从而间接的对企业年金缴费产生冲击,这里用一国居民整体收入项 税收占 GDP 的比重表示一国税收水平,取对数也可直接反映年金缴费对税收变化的反应程度,本文 将其定义为年金缴费的交叉税收弹性,预期其回归系数为负。

## 3. 收益能力的解释变量

模型中  $return_{it}$  为企业年金收益率,收益率反映企业年金账户保值增值的运行状况,这里用企业 年金账户变化情况,并减去当年缴费支出差额进行测算。企业年金作为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同时也是 一种投资储蓄,其保值增值作用尤为重要,较高的收益率会刺激企业和个人加入企业年金计划,从 而增加个体缴费。所以预期其回归系数为正。变量  $stock_{it}$  为股票市场运行状况指标,这里取 S&P 全 球股票指数年变化率。理论上来说,股票市场越景气,相应的会引发个体对投资股市等资本市场的 偏向,从而对年金储蓄产生一定的负向“替代效应”,但基于成熟的企业年金制度是允许年金账户 自由进入资本市场的,股票市场的利好也可以为年金带来更高的收益。所以股票市场运行状况对企 业年金的缴费影响方向不能确定,这取决于个体的风险偏好等一系列因素。

## 4. 国家养老体系影响的解释变量

模型中变量  $public_i$  为衡量国家  $i$  的养老金第一支柱即社会公共养老情况的指标,作为一国养老 保障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养老金第一支柱与企业年金之间会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一旦政府提 供的养老金可以达到个体需求,将会大大削弱个人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动机。所以预期其回归系数 为负。由于公共养老金支付情况连续时间数据的限制,而且国家社会公共养老政策在短时间内变化 不大,本文采用一个虚拟变量,衡量标准为 人均养老金公共支出,在样本中大于样本国家平均值的 国家取 1,小于平均值的国家取 0。

## 5. 社会环境影响的解释变量

模型中  $employ_{it}$  为国家  $i$  在  $t$  年的就业率,一般而言,就业率越高,处于缴纳企业年金范围的人 群规模越大,年金缴费也就相应越高,预期其估计系数为正。变量  $old_{it}$  为社会老龄化比率,一个国 家老龄化程度越高,即抚养比越高的情况下,个人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更高,理论上可以增大个 人为将来打算,增加企业年金投入的动机,但是劳动人口比率的下降也将减少年金的缴费人数。因 此,社会老龄化比率对企业年金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本文研究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年金缴费增长的促进效果,主要从年金缴费收入弹性和交叉 税收弹性两方面影响进行分析,在此对企业年金缴费基准模型做如下调整:

$$\ln pension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pension_{it-1} + \alpha_2 \ln income_{it} + \alpha_3 \ln income_{it} * D + \alpha_4 \ln tax_{it} + \alpha_5 return_{it-1} + \alpha_6 stock_{it} + \alpha_7 public_{it} + \alpha_8 employ_{it} + \alpha_9 old_{it} + \alpha_{10} Time + \mu_{it} \quad (2)$$

$$\ln pension_{it} = \beta_0 + \beta_1 \ln pension_{it-1} + \beta_2 \ln income_{it} + \beta_3 \ln tax_{it} + \beta_4 \ln tax_{it} * D + \beta_5 return_{it-1} + \beta_6 stock_{it} + \beta_7 public_{it} + \beta_8 employ_{it} + \beta_9 old_{it} + \beta_{10} Time + \mu_{it} \quad (3)$$

考虑到企业和个人缴纳年金决策的制定成本等因素将会制约其决策变化的及时性,将年金缴费 的一阶滞后项加入模型。本文将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设为一个虚拟变量  $D$ ,对于在缴费阶段有税 收优惠政策的国家取值为 1,缴费阶段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取值为 0。税收政策实施的标准这 里简单以缴纳企业年金阶段免税,即可以将企业年金缴费额税前列支。其余变量同前所述,这里考

虑到个体了解年金收益率信息的滞后性，将收益率的一阶滞后项替换其水平项，以更准确反映决策机制。(2)式考察的是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缴费收入弹性的影响， $\frac{\partial \ln pension_{it}}{\partial \ln income_{it}}$ 由不存在优惠税收政策时的  $\alpha_2$  变为存在优惠税收政策的  $\alpha_2 + \alpha_3$ ；(3)式考察的是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缴费交叉税收弹性的影响， $\frac{\partial \ln pension_{it}}{\partial \ln tax_{it}}$ 由不存在优惠税收政策时的  $\beta_2$  变为存在优惠税收政策的  $\beta_2 + \beta_3$ 。

(三)数据信息

基于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发达国家应用较早且机制较为成熟，本文的实证样本选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本文实证检验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 OECD 数据库<sup>①</sup>，代表股票市场运行状况的 S&P 全球股票指数年变化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sup>②</sup>。基于一些国家中企业年金缴费和税收等数据的缺失，将爱沙尼亚、法国、爱尔兰、日本、瑞典、希腊、土耳其、斯洛伐克共和国 7 个国家剔除，最后将样本确定为 26 个 OECD 国家，样本期间为 2001 - 2011 年。根据税收优惠政策的界定标准，这里只有澳大利亚、智利、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卢森堡、新西兰、斯洛文尼亚 7 个国家没有年金缴费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虚拟变量取值为 0，其余 19 个国家取值为 1。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2。

表 2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 变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样本量 |
|----------------------------|---------|----------|----------|----------|-----|
| Pension <sub>it</sub> (美元) | 932.483 | 1420.727 | 14.148   | 7310.395 | 286 |
| Income <sub>it</sub> (美元)  | 26035.0 | 10008.3  | 8130.0   | 62211.3  | 286 |
| Tax <sub>it</sub> (%)      | 34.7977 | 12.1028  | 7.0012   | 56.6632  | 286 |
| Return <sub>it</sub> (%)   | 12.8204 | 21.7983  | -72.5253 | 234.716  | 286 |
| Stock <sub>it</sub> (%)    | 9.3766  | 33.5405  | -66.5121 | 128.534  | 286 |
| Public <sub>i</sub>        | 0.3462  | 0.4766   | 0        | 1        | 286 |
| Employ <sub>it</sub> (%)   | 0.6704  | 0.0756   | 0.5141   | 0.8574   | 286 |
| Old <sub>it</sub> (%)      | 0.1421  | 0.0331   | 0.0475   | 0.2067   | 286 |
| D                          | 0.6923  | 0.4623   | 0        | 1        | 286 |

(四)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上述模型与数据，对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年金缴费规模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使用的计量软件为 stata11.0。在回归方法上，基于模型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和企业年金收益率等等内生变量，不能直接利用 OLS 进行估计，因而采用系统 GMM<sup>③</sup> 估计方法，表 3 为相应的估计结果。从表 3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估计模型的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基本符合预期，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没有通过联合显著性检验，也即此模型适合随机效应模型<sup>④</sup>。两个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人均年金缴费的一阶滞后项  $\ln pension_{it-1}$  的回归系数为正(0.8693 和 0.8671)，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反映了年金缴费稳定的时间趋势特征。人均总收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示收入的

①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②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CM.MKT.INDX.ZG>。  
③ 系统 GMM 估计方法同时利用自变量滞后项和自变量差分滞后项两类工具变量，将差分矩阵和水平矩阵相结合，有效解决了传统工具变量法信息不足和差分 GMM 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④ 加入国家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所以予以省略。

提高可以产生对企业年金的引致需求增加，模型 2 中，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的年金缴费的收入弹性为 0.1920，即收入提高 1%，将会引致年金缴费提高 0.192%；人均总收入变量与税收优惠政策虚拟变量乘积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也即在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企业年金缴费的收入弹性为 0.2064(0.1920 + 0.0144)，较之没有优惠政策的国家收入弹性提高 7.5%，即收入提高 1%，将会引致年金缴费提高 0.2064%。模型 3 中，税收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在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负向的交叉税收弹性为 -0.2468，税收提高 1%，将会引致年金缴费下降 0.2468%；我们看到税收变量与税收优惠政策乘积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在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其交叉税收弹性为 -0.203，当税收提高 1% 时，企业年金缴费将会有 0.203% 的下降，税收交叉弹性较之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下降 17.7%。即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综合税负的增加对企业年金缴费的抑制作用。

表 3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缴费影响的估计结果

|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 $\ln pension_{it-1}$         | 0.7966 ***<br>(0.0432)  | 0.8693 ***<br>(0.0454)  | 0.8671 ***<br>(0.0457)  |
| $\ln income_{it}$            | 0.1877 *<br>(0.0965)    | 0.1920 *<br>(0.1066)    | 0.1991 *<br>(0.1088)    |
| $\ln income_{it} \times D_i$ |                         | 0.0144 **<br>(0.0066)   |                         |
| $\ln tax_{it}$               | -0.2176 ***<br>(0.0532) | -0.2363 ***<br>(0.0641) | -0.2468 ***<br>(0.0657) |
| $\ln tax_{it} \times D_i$    |                         |                         | 0.0438 **<br>(0.0196)   |
| $\ln return_{it-1}$          | 0.0412<br>(0.0669)      | 0.0471<br>(0.0781)      | 0.0459<br>(0.0781)      |
| $stock_{it-1}$               | -0.0135<br>(0.1413)     | -0.0116<br>(0.1166)     | -0.0100<br>(0.1167)     |
| $public_i$                   | 0.1035<br>(0.1096)      | 0.1139<br>(0.1168)      | 0.1161<br>(0.1189)      |
| $employ_i$                   | 1.0373 **<br>(0.4932)   | 1.0893 **<br>(0.5076)   | 1.1413 **<br>(0.5208)   |
| $old_{it}$                   | 0.7650<br>(1.0736)      | 0.8287<br>(1.1921)      | 0.6385<br>(1.2292)      |
| T                            | -0.1065<br>(0.1317)     | -0.1139<br>(0.1168)     | -0.0090<br>(0.0079)     |
| Sargan 检验                    | 169.74<br>[0.000]       | 174.54<br>[0.000]       | 174.59<br>[0.000]       |
| Hansen 检验                    | 14.51<br>[1.000]        | 15.61<br>[1.000]        | 15.05<br>[1.000]        |
| AR(1) 检验                     | -2.49<br>[0.013]        | -2.53<br>[0.011]        | -2.54<br>[0.011]        |
| AR(2) 检验                     | -1.14<br>[0.251]        | -1.15<br>[0.249]        | -1.15<br>[0.249]        |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相应标准差。

年金收益率  $\text{return}_{it}$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收益率的提高对企业年金缴费有正向的激励倾向,但基于企业年金投资的长期性,个体对短期收益可能反映不那么敏感。股票指数变化率的系数为负,同样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企业年金投资的长期性。社会公共养老人均支出变量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现阶段生活成本的提高导致个体对未来生活能够完全依靠社会公共保障的信心不足,公共养老金有限的替代率并不能满足国民的需求。社会保障并没有对企业年金的缴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表明有限的基本社会保障并不会明显减弱国民的养老储蓄动机,国民对于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保险这种补充养老保障制度有着刚性需求。

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就业率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就业率的提高不仅直接影响缴费人群规模的扩大,还可以体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两者共同作用促进企业年金的积累。老龄化程度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一方面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会提高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增加企业年金缴费以备将来之需,但老龄化程度上升也即意味着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即缴费人群的减少,对人均年金缴费会有一个负向冲击,两方面效应综合体现为不显著的影响。

###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 OECD 国家的企业年金发展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增加企业年金资产的积累,促进一国补充养老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增大了年金的收入弹性,即当收入提高时,国民会把更高比例的收入用来进行企业年金的储蓄;另一方面减小了年金的交叉税收弹性,即当税收负担加重时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会缓解对企业年金积累的冲击,从而使一国的企业年金账户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这为中国制定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且我们发现就业率提高是促进年金缴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并不能自发的引致企业年金的生长,社保体系所提供的基本养老并不会对企业年金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年金收益率等短期效益指标对企业年金缴费的影响不显著。这对我国未来发展企业年金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要明确企业年金在我国主要是由企业主导,由企业自身决定是否要成立,而本次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个人缴费部分实行税收减免,企业缴纳年金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仍受 5% 上限的制约,因此,在雇主层面并没有感觉到实际意义上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刺激有限。因此建议根据企业性质逐步提高在企业层面的年金缴费的税前扣除比例到 10% - 15%。对于年金领取阶段的税收缴纳,对实行按月领取方式的账户实施更低比例的税率,以鼓励按月领取的养老金合理利用方式,细水长流,从而真正达到补充养老的目的。

其次,要认清企业年金在我国极不均衡的发展现状,目前我国企业承担基本保险领域的缴费已经相当高,从而出现企业年金参与者大多是垄断性央企,外资和民营企业积极性不高的局面。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防止企业年金的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可以考虑给予某些行业以及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更富有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对于一些垄断企业特别是某些垄断企业利用企业年金变相提高管理层待遇的做法予以适当的限制,提防高收入群体利用企业年金进行不合理的避税,防止企业年金的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应鼓励和推动金融保险业的发展,鼓励针对非稳定就业人群(失业者、非持续任职者)推出同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职业年金产品,加强推动个人补充养老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

最后,在建立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政府对提高个人收入和解决就业等问题的关注和

努力也会有利于企业年金的发展。个人收入的提高可以从根本上增加企业年金缴费的来源,个人当前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才是居民重视未来生活、增强养老储备意识的基础。此外,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成熟健康的资本市场、正确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开透明的政府监管制度、公平公正的利益主体格局这些都是企业年金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环境。

#### 参考文献:

- [1] 张勇, 陈耕云. 中国基础养老金的支付能力研究 [J]. 财经论丛, 2008, (4): 63-69.
- [2] 郑秉文. 中国企业年金发展滞后的政策因素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2): 2-23.
- [3] Horiba Y., K. Yoshida.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Corporate Pension Coverage [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02, 54 (5): 537-555.
- [4] Fehr H., H. Jess. Who Benefits from the Reform of Pension Taxation in Germany [J]. Fiscal Studies, 2007, 28(1): 73-101.
- [5] Fehr H., C. Habermann, F. Kindermann. Tax-favored Retirement Accounts: Are They Efficient in Increasing Savings and Growth? [J].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2008, 64(2): 171-198.
- [6] Gentry W. M., C. G. Rothschild. Enhancing Retirement Security Through the Tax Code: the Efficacy of Tax-based Subsidies in Life Annuity Markets [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 2010, 9(2): 185-218.
- [7] Disney R., C. Emmerson, Wakefield M. Tax Reform and Retirement Saving Incentives: Take up of Stakeholder Pensions in the UK [J]. Economics, 2010, 77(4): 213-233.
- [8] 邓大松, 刘昌平. 中国企业年金若干制度问题研究 [J]. 经济评论, 2003, (6): 70-74.
- [9] 朱青. 国外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制度及启示 [J]. 涉外税务, 2003, (8): 46-50.
- [10] 刘云龙, 姚枝仲, 傅安平. 中国企业年金发展与税收政策支持 [J]. 管理世界, 2002, (4): 45-54.

##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Annuity and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OECD Countries

ZHU Ming-lai, JI 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concerning enterprise annuity in the OECD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is then made with GMM method on the basis of data of 26 OECD countries from 2001 to 2011. It is found that tax cut in the contribution stage is a significant incentive for the contribution of enterprise annuity as it both increases the contribution's income elasticity and weakens the contribution's tax elasticity.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improved employment index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contribution while short-term account revenue, stock returns and public pension spending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ontribution.

**Key words:** tax incentives; enterprise annuity; elasticity

(责任编辑: 风 云)